

目 录

辜鸿铭(1857—1928年)

辜鸿铭先生轶事	梁实秋(7)
记辜鸿铭	胡适(9)
回忆辜鸿铭先生	罗家伦(14)
绝代的学者	凌叔华(19)
英文门教授辜鸿铭	冯友兰(23)

蔡元培(1868—1940年)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33)
蔡子民先生的最后遗言	周新(41)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罗家伦口述 马星野记录(52)
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	蒋梦麟(73)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傅斯年(76)
记蔡子民先生	林语堂(80)
回忆蔡元培先生	梁漱溟(83)

章太炎(1869—1936年)

- 太炎先生轶事简述 汤国梨口述 胡觉民整理(94)
- 一辈子讲真话的人
- 纪念先祖父太炎先生诞辰 章念驰(110)
- 我所见晚年的章炳麟 左舜生(113)
- 章炳麟渊博怪诞 袁宙宗(118)
- 章太炎 张中行(125)
- 追忆章太炎先生
- 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 薛慧山(128)
- 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 陈存仁(138)

梁启超(1873—1929年)

- 三十自述 梁启超(164)
- 上台唱戏 胡适(169)
- 无穷的恩惠 胡适(172)
- 记梁任公 刘太希(176)
- 梁任公先生印象记 梁容若(183)
-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梁实秋(188)
- 忆梁启超先生 刘海粟(191)

齐如山(1875—1962年)

- 我的外公齐如山
- 纪念齐如山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 贺宝善(209)

- | | |
|--------------|-----------|
| 纪念先翁齐如山先生 | 齐黄媛珊(226) |
| 读《国剧艺术汇考》的感想 | 台静农(233) |
| 为梅兰芳编戏与排戏 | 陈纪滢(236) |
| 记齐如山 | 谢冰莹(251) |

张伯苓(1876—1951 年)

- | | |
|--------------|-----------|
| 教育家张伯苓 | 胡 适(261) |
| 巍巍乎吾南开大校长 | 柳无忌(266) |
|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节选) | 宁恩承(269) |
| 我们的老校长 | 端木蕻良(289) |

王国维(1877—1927 年)

- | | |
|---------------|----------|
| 自序 | 王国维(303) |
| 最是人间留不住 | 王东明(307) |
| 怀念我的父亲王国维 | 王东明(311) |
| ●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 | 梁启超(322) |
| 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 | 蒋复璁(324) |

连 横(1878—1936 年)

- | | |
|-----------|----------|
| 先父生平事迹略述 | 连震东(338) |
| 记外祖父连雅堂先生 | 林文月(348) |
| 连雅堂与王香禅 | 林文月(362) |

陈独秀(1879—194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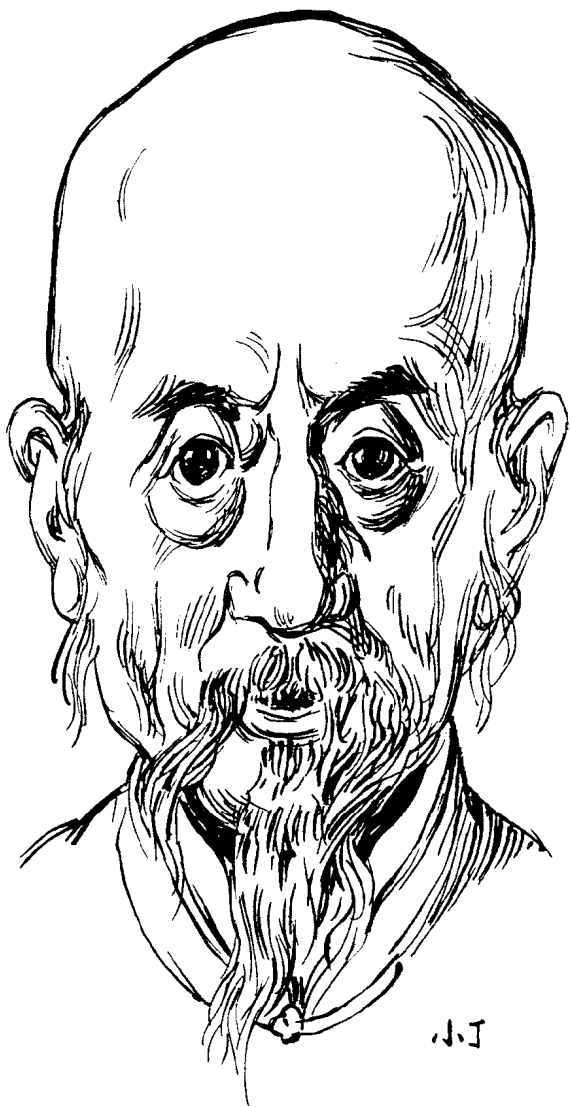
- | | |
|---------------------|----------|
| 实庵自传 | 陈独秀(386) |
| 谈谈陈独秀 | 蒋梦麟(399) |
| 陈独秀入狱的经过 | 胡适(404) |
| 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 | 郑超麟(408) |
| 酒旗风暖少年狂
——忆陈独秀先生 | 台静农(414) |

于右任(1879—1964年)

- | | |
|-------------|----------|
| 怀恩记(节选) | 于右任(429) |
| 山高树大于右老 | 丁中江(440) |
| 于右任给我写字 | 钱君匋(452) |
| 于右老图报红粉知己 | 陈存仁(454) |
| 永怀于右老·草书慰国魂 | 陆铿(473) |

李叔同(1880—1942年)

- | | |
|---------|----------|
| 两法师 | 叶圣陶(491) |
| 弘一法师之出家 | 夏丏尊(498) |
| 弘一大师的遗书 | 夏丏尊(504) |
| 怀李叔同先生 | 丰子恺(507) |
| 弘一法师遗墨 | 刘质平(514) |



辜 鴻 銘

辜 鸿 铭

辜鸿铭(1857—1928年),原籍福建同安,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英文名 KU HONG—MING,闽南音 KOH HONG BENG,名汤生(TOMSON),号立诚,别署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斋名读易草堂。宣统赐谥唐公。曾祖辜礼欢,为最早至槟榔屿的华侨之一,曾任英属马来亚吉打首任华人“甲必丹”(首领)。祖父辜龙池,任职政府部门,曾获吉打苏丹所颁勋衔。父辜紫云,在槟榔屿为英商布朗经营橡胶园。母为欧洲人。辜鸿铭,紫云次子,并寄在布朗夫妇名下为养子。

童年在槟榔屿英国王子中心学校学习英语。同治八年(1869年)十三岁,即随养父布朗远赴欧洲。同治十二年(1873年),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院学习西方文学。光绪三年(1877年)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为我国完成全部英国式教育的第一位留学生。此后曾入德国莱比锡工学院,获土木工程科文凭。又曾在法国意大利等国游学。在欧洲十一年,潜心于西方文学、哲学,精通马来、英、德、法、拉丁、希腊等语文。

光绪六年(1880年)返回槟榔屿,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任职。光绪八年(1882年)在新加坡海滨旅馆访晤维新派人物马建忠,“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热烈向慕祖国传统文化。遂辞职返槟榔屿,着中土衣履,蓄发留辫,苦读五经诸子。

光绪九年(1883年),以英文发表《中国学》一文,论述1883年以前西方中国学发展概况,并激烈批评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中国学研究中的不良风气和治学态度。

光绪十一年(1885年),入洋务派代表人物、两广总督张之洞幕,任洋文案,自此粤鄂相随,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后达二十年。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随张自广州至武昌。光绪十七年(1891年),“长江教案”爆发,为维护民族尊严,在上海英文《字林西报》发表《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该文被认为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的重要文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8月,英译《论语》出版,后又译出《大学》,成为我国向西方世界弘扬孔教之第一人。林语堂评价为“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庚子事变后,张之洞、刘坤一两总督倡“东南互保”,授意辜鸿铭在海外以英文发表《尊王:中国人民对皇太后及其政权真实感情的陈述》,申明中国大义,要求列强对慈禧太后“必尊必敬”,为与列强议和制造舆论。后与其它英文政论结集为《尊王篇:一个中国人对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想法》(英文直译为《总督衙门来书》)。光绪三十一年(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发表《然则,治之,知之:日俄战争之道德因素》,抨击列强亚洲政策。同年,译述《中庸》。翌年9月,任黄浦江浚治局督办,在职三年,任内曾揭露洋商侵吞巨款大案。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通过俄国驻沪总领事以《然则,治之,知之:日俄战争之道德因素》等书赠予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回赠自己国外出版的违禁著作,并公开发表《致一个中国人的信》作为答覆,迅即引起欧、亚两洲舆论界普遍关注。托尔斯泰在公开信中说:“我现在从你的书里知道好战的思想——想用武力把欧洲民族

4 百年国士

的举动打退——在中国觉醒了……”但又要求中国人民“继续过他们的宁静的、勤劳的农民生活，并且使自己的行为不违背孔、道、佛三教的意义……”那么“他们现在所受的痛苦自会消灭，将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强国能够把他们屈服。”本年，王国维作《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称“我国之能知《中庸》之真意者，殆未有过于辜氏者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之洞入阁，随至北京。翌年，奉委任外务部员外郎，后升至左丞。曾应诏作《上德宗皇帝条陈时事书》，言及“今日我中国士大夫不知西洋乱政所由来，徒慕其奢靡，遂致朝野皆倡言行西法、兴新政，一国若狂。”认为当时“非患无新法而患不守法耳。”因此，宜坚守君主制度，“申成宪以存纲纪而固邦本”。宣统二年(1910年)一月，以“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资格，宣统皇帝赏给文科进士第二名(榜首为严复)。二月，作《中国的牛津运动》，以英国纽曼大主教1883年领导的反现代化牛津运动比拟张之洞的文化保守运动，后经德国汉学家卫礼贤译为德文，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之理由》，并指定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必读书。书中称：“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8月，印行《张文襄幕府纪闻》，距张之洞逝世适届一年，书中检拾旧闻，臧否人物，讽评时政，深邃诙谐，笔下多今昔之慨。12月，任南洋公学校长。辛亥革命后辞职，以示继续忠于清室。

1915年4月，在北京出版英文著作《中国人的精神》(一名《春秋大义》，或《原华》)，自称该书“试图阐明中国人的精神，并揭示中国文明的价值”。书中论述中国文明的精华是“以礼来自我约束”中国人性格的特征是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中国人的精神是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的产物。”“是一种心灵状态、一种灵魂趋向，……一种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同时认为孔子之道可挽救世界危局。9

月，应蔡元培聘，任北京大学教授，在研究所讲授英国诗文。1916年，《春秋大义》德译本出版，德国文化界兴起“辜鸿铭热”。1917年8月，将大战时期所著英文政论结集为《呐喊——辜鸿铭硕士关于战争及其它的观察和思考》一书，后被译为德文。本年，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作《辜鸿铭论》，推介《春秋大义》一书，称辜为“中国批评家”、“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1918年，李大钊撰文评《春秋大义》称：“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1919年7、8月连续以英文作《反对中国文学革命》、《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读写能力和教育》等文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攻讦，反对文学革命论者将中国古文视为死文字。8月，胡适则在《每周评论》发表“随感录”，善意批评其保守态度（1935年胡适又作《记辜鸿铭》）。

1921年，英国文学家毛姆来访，事后作《辜鸿铭访问记》，文中记其言云：“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一个代表。”1924年4月，会晤来华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10月，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赴日进行巡回学术讲演。其间，曾到台湾宣讲孔子学说。在日讲辞被辑为《辜鸿铭讲演集》，1927年秋离日本，临行前曾书赠大东文化协会干事长萨摩雄次：“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风流，乃为真豪杰；不爱财，不爱酒，不爱夫人，是个老头驼。”

1928年4月30日，以肺炎病逝于北平寓所。卒前数日，曾口授上清室奏折，犹言及东西政教之不同。废帝溥仪派员致祭，赐“含谏吐忠”旌额，谥以唐公。

妻于氏，名淑姑。妾日人吉田贞子（一名蓉子），继室某氏。有一子二女。子辜守庸，为贞子所生；女辜珍东、辜娜娃，为淑姑所生。

著译有：专著、论文集：《中国学》（英文，1883年）、《尊王篇》

6 百年国士

(英文,1901年)、《日俄战争之道德因素》(英文,1906年)、《中国的牛津运动》(英文,1910年)、《张文襄幕府纪闻》(中文,1910年)、《中国人的精神》(英文,1915年)、《呐喊》(英文,1917年)、罗振玉选编《读易草堂文集》(中文,二卷,1922年)、《所有受过英语教育的人应读之文》(英文,1922年)、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编《辜鸿铭讲演集》(日文,1925年)、日本·萨摩雄次编《辜鸿铭论集》(日文,1941年)等;中译英:《论语》(1898年)、《大学》(未印行)、《中庸》(1904年)等;英译中:英·柯珀(1731—1800年)叙事长诗《华英合璧:痴汉骑马歌》;文集:冯天瑜编《辜鸿铭文集》(1985年)、黄兴涛等编译《辜鸿铭文集》(2卷,1996年)。

传记、评传、回忆有:《辜鸿铭传记资料》(台湾版,1960年)、伍国庆编《文坛怪杰辜鸿铭》(24篇,1988年)、黄兴涛著《文化怪杰辜鸿铭》(1995年)、孔庆茂著《辜鸿铭评传》(1996年)、黄兴涛著《闲话辜鸿铭》(1997年)、宋炳辉编《辜鸿铭印象》(33篇,1997年)等。

辜鸿铭先生轶事

梁实秋

辜鸿铭先生以茶壶譬丈夫，以茶杯譬妻子，故赞成多妻制，诚怪论也。

先生之怪论甚多，常告人以姓辜之故，谓始祖实为罪犯。又言始祖犯罪，不足引以为羞；若数典忘祖，方属可耻云。

先生深于英国文学之素养。或叩以养成之道，曰：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作根基。又言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幼年读一猫一狗之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先生极赞成中国私塾教授法，以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尤须背诵如流水也。

先生之书法，极天真烂漫之致，别字虽不甚多，亦非极少。盖先生生于异国，学于苏格兰，比壮年入张之洞幕，始沉潜于故邦载籍云。

先生好选《诗经》中成句，译英文诗，虽未能天衣无缝，亦颇极传神之妙，惜以古衣冠加乎无色民族之身上耳，先生以“情”译 Poetry，以“理”译 Philosophy，以“事”译 History，以“物”译 Science，以“阴阳”译 Physic，以“五行”译 Chemistry，以“红福”译 Juno，以“清福”译 Minerva，以“艳福”译 Venus，于此可见其融合中外之精神。

先生喜征逐之乐，故不修边幅，既垂长辩，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者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先生对于妓者颇有同情，恒操英语曰：Prostitute 者，Destitute 也。（意谓卖淫者卖穷也）

先生多情而不专，夫人在一位以上。尝娶日妇，妇死哭之悲，悼之之痛，历久不渝。先生尝患贫，故一闻丐者呼之声，立即拔关而出，界以小银币一二枚，勃溪之声，尝因之而起。

先生操多种方言，通几国文字；日之通士，尤敬慕先生，故日本人所办之英文报纸，常发表先生忠君爱国之文字。文中畅引中国经典，滔滔不绝，其引文之长，令人兴喧宾夺主之感，顾趣味弥永，凡读其文者只觉其长，不觉其臭。

（1927年）

记辜鸿铭

胡适

民国十年十月十三日夜，我的老同学王彦祖先生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先生(Men. Demieville)在他家中吃饭；陪客的有辜鸿铭先生、法国的某先生、徐墀先生和我；还有几位，我记不得了。这一晚的谈话，我的日记里留有一个简单的记载，今天我翻看旧日记，想起辜鸿铭的死，想起那晚上的主人王彦祖也死了，想起十三年之中人事变迁的迅速，我心里颇有不少的感触。所以我根据我的旧日记，用记忆来补充他，写成这篇辜鸿铭的回忆。

辜鸿铭向来是反对我的主张的，曾经用英文在杂志上驳我；有一次为了我在《每周评论》上写的一段短文，他竟对我说，要在法庭控告我。然而在见面时，他对我总很客气。

这一晚他先到了王家，两位法国客人也到了；我进来和他握手时，他对那两位外国客说：Here comes my learned enemy！（我的论敌来了！）大家都笑了。

入座之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弥微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坐在辜疯子 and 徐癫子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Crazy ku”和“Cranky Hsu”的两个绰号。

一会儿，他对我说：“去年张少轩(张勋)过生日，我送了他一副

对子，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什么？”我当他是集句的对联，一时想不起好对句，只好问他，“想不出好对句；你对的是什么？”他说：“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我也笑了。

他又问：“你晓得这副对子的意思吗？”我说：“‘菊残犹有傲霜枝’当然是张大帅和您老先生的辫子了。‘擎雨盖’是什么呢？”他说：“是清朝的大帽。”我们又大笑。

他在席上大讲他最得意的安福国会选举时他卖票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听他亲口讲过好几次了，每回他总添上一点新花样，这也是老年人说往事的普通毛病。

安福部当权时，颁布了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本人不必到场，自有人拿文凭去登记投票。据说当时的市价是每张文凭可卖二百元。兜买的人拿了文凭去，还可以变化发财。譬如一张文凭上的姓名是 Wu Ting，第一次可报“武定”，第二次可报“丁武”，第三次可报“吴廷”，第四次可说是浙江方言的“丁和”。这样办法，原价二百元的，就可以卖八百元了。

辜鸿铭卖票的故事确是很有趣的。他说：“某人来运动我投他一票，我说，我的文凭早就丢了。他说：‘谁不认得你老人家？只要你亲自来投票，用不着文凭。’我说：‘人家卖两百块钱一票，我老辜至少要卖五百块。’他说：‘别人两百，你老人家三百。’我说：‘四百块，少一毛钱不来，还得先付现款，不要支票。’他要还价，我叫他滚出去。他只好说：‘四百块钱依您老人家。可是投票时务必请你到场。’

“选举的前一天，他果然把四百块钞票和选举入场券都带来了，还再三叮嘱我明天务必到场。等他走了，我立刻出门，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块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你们都知道，她

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两天工夫，钱花光了，我才回北京来。

“他听说我回来了，赶到我家，大骂我无信义。我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个留学生小政客，说：‘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那小子看见我的棍子，真个乖乖地逃出去了。”

说完了这个故事，他回过头来对我说：“你知道，有句俗话：‘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上回听说孔教会要去祭孔子，我编了一首白话诗：

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

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胡先生，我的白话诗好不好？”

一会儿，辜鸿铭指着那两位法国客人大发议论了。他说：“先生们，不要见怪，我要说你们法国人真有点不害羞！怎么把一个文学博士的名誉学位送给某人呢！某先生，你的报上还登出某人的照片来，坐在一张书桌边，桌上堆着一大堆书，题做‘某大总统著书之图’！呃，呃，真羞煞人！我老辜向来佩服你们贵国，——La belle Prance！现在真丢尽了你们的 La belle Prance 的脸了！你们要是送我老辜一个文学博士，也还不怎样丢人！可怜的班乐卫先生，他把博士学位送给某人，呃！”

那两位法国客人听了老辜的话，都很感觉不安，那位什么报的主笔尤其脸红耳赤，他不好不替他的政府辩护一两句。辜鸿铭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

“你别说了。有一个时候，我老辜得意的时候，你每天来看我，我开口说一句话，你就说：‘辜先生，您等一等。’你就连忙摸出铅笔

和笔记本子来，我说一句，你记一句，一个字也不肯放过。现在我老辜倒楣了，你的影子也不上我门上来了。”

那位法国记者，脸上更红了。我们的主人，便觉得空气太紧张了，只好提议，大家散坐。

上文说起辜鸿铭有一次要上法庭控告我，这件事我也应该补叙一笔。

在民国八年八月间，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三期登出了一段随感录：

[辜鸿铭]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当初辜鸿铭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戴着假发结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这段话是高尔谦先生告诉我的，我深信高尔谦先生不说谎话，所以我登在报上。那一期出版的一天，是一个星期日，我在北京西车站同一个朋友吃晚饭。我忽然看见辜鸿铭先生同七八个人也在那里吃饭，我身边恰好带了一张《每周评论》，我就走过去，把报送给辜先生看。他看了一遍，对我说：“这段记事不很确实。我告诉你我剪辫子的故事。我的父亲送我出洋时，把我托给一位苏格兰教士，请他照顾我。但他对我说：‘现在我完全托了某先生，你什么事都应该听他的话。只有两件事我要叮嘱你：第一，你不可进耶稣教；第二，你不可剪辫子。’我到了苏格兰，跟着我的保护人，过了许多时。每天出门，街上小孩子总跟着我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